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5.008

民国前期烟台的商业、商人、商会

于军

(烟台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670)

摘要:近代时期的烟台借助自然和区位优势,曾一度领风气之先,成为19世纪我国东部沿海的新兴城市之一。但烟台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在工业、城市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先天的缺陷,城市发展后劲不足,且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民国之后,随着青岛等周边港口城市的崛起,烟台商业呈现出停滞、衰落的局面。绝地求生烟台商人随机应变、因地制宜,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学习、借鉴,迅速调整着力点,走上了发展工业,以民族工商业兴市,谋求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建立商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商业精英加入了商会组织,并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保障自身权益,推动行业经济发展。烟台商人通过这一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职能。同时,商人、商会也因各自在社会领域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烟台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烟台;民国前期;商业;商人;商会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5-0054-07

烟台开埠之前只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商业可言。开埠后,烟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初,烟台已经成为商品集散的中心和颇具规模的港口城市,商品的流通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增长了十倍,商品的价值量由数百万两增长到数千万两,保持着山东第一港口的地位。这一切和烟台商人的努力分不开。

近代时期的烟台借助自然和区位优势,曾一度领风气之先,成为19世纪我国东部沿海的新兴城市之一。但烟台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在作为城市基础的其他元素,如工业、城市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城市发展后劲不足,且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民国之后,随着区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青岛等周边港口城市的崛起,烟台港的地位受到挑战,港口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下降,商贸范围逐渐缩小,内部贸易也呈现出停滞、衰落的趋势。烟台的城市发展因此走入困局。但前期烟台港口、商业以及贸易的发展让烟台商人得到了很好的历练,绝地求生烟台商人随机应

变、因地制宜,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学习、借鉴,迅速调整着力点,走上了发展工业,以民族工商业兴市,谋求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商会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商业精英加入了商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保障自身权益,推动行业经济发展,并通过这一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职能。同时,商人、商会也随着自己在社会领域影响力的提高,推动着烟台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一、无奈停滞中的商业

商业贸易在烟台的经济发展中曾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在进入民国时期后,烟台贸易数据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先看一下民国前期烟台历年贸易的总体情况。

由表1中可以看出,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间,烟台贸易总值总体上每年在3000—4000万海关两左右,只有1921年陡增至近6300万海关两,1922年和1923年有所下降,但仍属于历史高位,1924年以后基本上就徘徊在4000万海关两之内了。

收稿日期:2023-05-0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近代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山东调查研究”(17CLSJ05)

作者简介:于军(1970—),男,山东文登人,历史学硕士,烟台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表1 民国初期烟台历年贸易总值表(单位:万海关两)^{[1]14-19}

年份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总值	3440	3495	2836	4373	3996	3821	3582	4162
年份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总值	4317	6270	5171	5235	3803	3723	3779	3399

首先 1921 年贸易量陡增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年烟台海坝工程竣工,使烟台港可以同时停靠两艘千吨级的货轮,结束了过去只能停靠 500 吨级货船、每遇恶劣天气船舶无法装卸的历史,极大提高了货轮装卸效率。其次,该年洪水泛滥,铁路交通受影响很大,原本通过胶济铁路运输的货物,改经其他路径到了烟台汇聚。最后,公路交通方面,1920 年开始修建的烟潍公路在 1922 年全线竣工,全长 295 公里,横贯山东半岛北部,西端连接胶济铁路,中间经过昌邑、掖县、黄县、蓬莱等地,有效地提升了货物运输能力。

但为什么烟台贸易量的增长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在各方势力努力改善当地交通条件的情况下,依然没能挽救烟台贸易停滞及至下滑的趋势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青岛的交通设施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变化。同样是港口城市,1898 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不久,德国国会迅速通过了拨款 500 万马克作为建港经费的议案,不久又追加了 350 万马克,1904 年设备齐全、技术先进的大港一号码头交付营运,即使最大的货轮也可在码头上将货物直接转装上火车。同年 6 月,横贯山东、长达 395.2 公里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德国公司采取了独特的运价政策,从海外输入的货物,运价比内地货物低,输出货物运价又比输入货物低,凭借低廉的输出运价吸引山东其他城市的商人把内地货物运往青岛,在青岛加工为成品后再销往内地或运送国外,同时还把部分津浦铁路的货源也吸引了过来。棉花、草辫、花生等大宗商品由青岛运出,把铁路沿线和内地的货物“洗劫”一空。整个华北地区变成了青岛的商业腹地,使青岛港进出口货物量以年均 13% 的增长率快速发展,一举超过了烟台港。从表 2 对比中可以看到,青岛交通设施改善前后的贸易总额占比情况,烟台港贸易总额占比由 72% 下降到 35%,青岛逐渐取代了烟台成为山东第一港。另外,北方的秦皇岛和大连港口分别在 1898 年和 1899 年开埠,东北地区的货物也不再到烟台集散。面对青岛港的崛起,

烟台逐渐丧失了优势地位,贸易量的萎缩也成为必然。

表2 青岛、烟台纯进出口贸易总额价值表
(单位:海关两)^{[1]7-11}

年份	烟台港	青岛港
1903	38183913(72%)	14598421(28%)
1913	31641234(35%)	59168881(65%)

在民国前期的商业贸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从表 3 数据中可以发现,自 1912 年起烟台进口洋货数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出口土货数额出现上升趋势,1919 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几年里出口额几乎是进口额的 2 倍。

表3 1912—1927 年烟台进出口贸易统计
(单位:万海关两)^{[1]14}

年份	进口	出口	总计
1912	441	358	799
1913	521	365	886
1914	560	336	896
1915	581	480	1061
1916	678	521	1199
1917	896	351	1247
1918	637	439	1076
1919	444	495	939
1920	481	822	1303
1921	701	1366	2067
1922	548	1108	1656
1923	541	730	1271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 1912—1920 年烟台进口大宗洋货的数据中看出具体的变化。

表4 1912—1920 年烟台进口大宗洋货^{[1]17}

年份	1912	1916	1918	1920
棉布(匹)	616336	385875	321572	354175
棉纱(担)	36825	34820	17449	4020
金属品(担)	87138	39522	28328	173669
煤(吨)	56844	20112	13511	2748
煤油(加仑)	3865110	1030986	40900	610535
染料(海关两)	59955	—	6584	70392
糖类(担)	155411	137407	142923	103645
纸张(担)	7362	6013	4687	4946
面粉(担)	167691	629	470	5926
海菜(担)	40129	27651	20057	1998

由表4可以得知,民国前期烟台对外贸易中,进口的大宗货物有棉布、棉纱、煤油、染料等十余种,所有进口洋货都出现数额下降的趋势,棉布由1912年的约62万匹降至1920年的35万匹。煤油在8年间降至约此前的1/6。进口洋货数额整体下滑的原因显然并不是国内消费市场找到了替代品。进口煤油价格便宜而且亮度高,很受当时民众的欢迎;先进的纺纱技术,低廉的棉纱价格,依然是土货无法匹敌的。根本原因依然是烟台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被青岛所取代,洋货进入山东的主渠道由烟台港变成了青岛港。

二、不断求变中的商人

烟台港区位优势的丧失对烟台商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对烟台商人利益和生存空间的影响同样不小。

商人在近代的内涵不仅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还包括那些从事加工制造、交通运输、银行信托等活动的经营者。开埠前,烟台由于基本上以渔业和农业为主,商业仍停留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的调剂余缺。开埠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快吸引了中外商人接踵而至,周边城镇广大农村人口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也纷纷到烟台聚居。民国前期,烟台贸易量激增,人口也随之增长,由1911年54 459人增长至1929年的119 305人,直接增长了一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活动。

烟台商人主要来自省内的黄县、掖县和潍县等地,从事粮食、棉纱、水产、茧绸、豆油、砂糖等贸易业务,其中资本额超过100万两的有水产商“大成栈”、油商“双盛泰”和“万顺恒”3家商号,10万到100万之间的8家,5万到10万的15家,共26家,总资本达600余万两,省外商帮有20余家商号^{[2]247}。其中黄县、掖县栈商资本势力雄厚,他们经商灵活,不拘泥于一地,其商业活动范围不仅在胶东地区,即使在东北、京津一带也声望极高。民国前期,黄县商人在东北奉天商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896年到1923年,在奉天以天、吉、兴、洪为字号开设的店铺有16处之多。黄县的丁氏家族是典型代表,丁家主营当铺业,其当铺遍布东部11省,山东每县都至少设有一个,此外还经营粮行、煤、丝等,如烟台的“元丰祥”煤

号,济南四马路的“丰华”石油号,北京的粮行等^{[3]44}。

烟台商人具有灵活求变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在掖县商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青岛开埠后,便利的铁路交通和当局采取的优惠措施,吸引了已经在烟台经营的商号。草辫业兴起于烟台,掖县商人首先在烟台开设了第一家专营商号,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更多的同县人到烟台开设辫行。当胶济铁路开通后,草辫通过铁路运输到青岛比海运到烟台要快捷且费用低,因此,烟台的掖县籍商人陆续转移到青岛。查阅1923年《烟台总商会职员表》会发现,会长、副会长为福山县人,特别会董8人,会董40人,而掖县商人只有2人,只占商会总人数的4%。

自从烟台被卷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以来,左右烟台商人命运的因素更多的是西方的资本势力。如从事土丝、茧绸等商品生产和出口的商人,由于西方产品大量倾销而纷纷破产,大批原料如棉花、柞蚕丝又被西方资本建立的纺纱厂垄断收购,家庭作坊式的纺织业逐渐被淘汰,传统小农经济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被迫开始转型,灵活善变的烟台商人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不断变换着自身的职业色彩。纺纱业衰落,继之草帽辫兴起,草帽辫衰落后又被花边业和发网业所取代,甚至有的商人创建了对外贸公司并与洋商争利。发网业在1914年出口额为19 099海关两,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时接近百万海关两,仅烟台一地就有多达百余家发网纺织厂商,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亿中公司的创办人孙伯峨。他在钻研出漂染加工人发的方法后,打破了西方对该项技术的垄断,使编织发网不再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料,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让烟台的发网业在全国遥遥领先于同行。孙伯峨的成功既来自西方市场经济的压力,也是烟台商人不断求变的结果。然而,到了1925年前后,由于欧洲妇女生活习惯的改变,发网的销路受阻,价格跌落,从此该业一蹶不振,烟台发网商由繁盛时的百余家降到36家。后来的花边商和丝绸商的命运大致相仿,产品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繁荣数年后转入勉强维持,以至销声匿迹。

在烟台庞大的商人队伍中,活跃着外国商人这一群体。民国前期外国人在烟台开设的洋行已

经达到 30 余家,主要从事银行、保险金融类业务以及棉布、棉纱、煤油的经营和贸易。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和通商特权,不仅垄断了大宗的洋货输入,还逐步控制了烟台重要的土货输出:美孚垄断了煤油输入;和记、三井、仁德、敦和、捷成等八家控制了丝绸贸易,年购入额达到 600 万两;永和、益德、普西、百多、敦和、仁德垄断了花边业 45% 的收购量,对民族工商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贸易价格及交易行情皆受到洋行的控制,中国商人受到压榨只能忍气吞声。精明的烟台商人李虹轩和李明轩兄弟二人却大胆地迈出了独立对外贸易的第一步。1908 年他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华资对外贸易公司(Shantung Silk & Lace Co. Ltd),中文为“信丰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就是从事胶东地区的特色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包括丝绸、花边、刺绣、草辫、发网等产品,由于严把质量关,产品畅销到纽约、伦敦等地的大百货公司。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扩大,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 1914 年,仅发网业务就成立了四个工厂,员工达到 1000 余人^{[4]65}。李氏兄弟因在压力下敢于求变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商人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拓者,在促进当地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开阔了烟台商人的国际视野,拉近了与国际市场的距离。

勤思求变的烟台商人,总是能在市场夹缝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民国前期,人们思想活跃,振兴实业、奖励投资的政策让有识之士嗅到了商机,唤起了国内商业精英们的创业热情,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工业,在这股潮流中,烟台商人也不甘人后,再次展现了大胆求变的创业精神。如烟台商人李东山在长期的小贩生涯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练就了过人的胆识,从 1912 年起,他先后创办过伞厂、玻璃厂、花炮厂,这些企业在烟台都是新生事物,体现出他不甘人后、灵活善变的创新精神。李东山在 1915 年创办宝时造钟厂,为解决技术设备难题,数次奔赴日本钟表厂参观学习,潜心钻研,于 1920 年成功仿制了日本“马球”钟的机芯、外观款式,并加入了一些民族元素。初期,李东山生产的三千只挂钟、座钟在胶东一带销售,产量逐年增加后,开始进入北方市场,在 1928 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深受东北人民的欢迎,

逐渐将“马球”“象球”等日本品牌的时钟挤出东北市场。1927 年,一部分从宝时造钟厂出来的人员成立了烟台第二家钟厂——永康公司,产品多仿制西欧的台钟、挂钟,因起点高,产品一经上市就畅销于南方各大城市和东南亚国家。一个城市同时拥有两家造钟企业,且年均出货量达 3 万多只,这在当时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李东山创办的宝时造钟厂在烟台及至全国开创了中国人机械制造钟表的先河,打破了此前只能进口外国机制工业品的格局。

烟台临海,盐业资源丰富。随着西方精盐的不断输入,中国人开始认识了精盐。1919 年商人林子有抓住商机,集资在烟台西沙旺创办了通益精盐公司。该公司技术先进,配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在生产中严控质量检验,保证产品化学纯度过关,同时还大量引进现代化机器和电子设备,使其产品在国内异军突起。1932 年,通益精盐公司资本达到 100 万元,年产量大约是 30 万吨,占全国八大精盐公司(东三省除外)总产量的 26%,产品销往南方汉口、九江、芜湖等长江口岸各大中心城市。林子有的求变不仅在于大胆采用西方国家先进的设备及科学技术,还在于比较关心工人的福利待遇,实施 8 小时工作制,公司职工住宿、理发、看病、洗澡等一律免费,这种人性化的管理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从孙伯峨、林子有等人身上,我们能感受到烟台商人的韧性。烟台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商人的努力,青岛的崛起给烟台商业及商人带来了生存的压力,但压力可以转变为动力。在市场的起伏中,烟台商人不断在求变中成长,商会的出现就是例证。

三、多重角色中的商会

商会是伴随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商人组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馆、公所等传统商人组织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与西方的贸易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商人逐渐意识到成立商会能对自己起到助力作用,山东商人也不例外。至 1912 年,山东各县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商会组织,总数达到 47 个。

烟台开埠以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兴盛,工商

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20世纪初进入了全盛时期,出现了1700多家商户,其中的义昌、顺盛、天成栈、双盛泰、鸿泰、恒茂、福泰、协茂八家最为有名。1901年这八家商号自发在北大街天后宫前院成立了“烟台大会”,次年改名为“烟台商务会”,这是烟台最早的商会组织。

烟台商会成立的时间早于晚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的时间,甚至早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时间,这与烟台作为山东第一个开埠城市有关。大批的外国商人及传教士纷至沓来,与国内南来北往的华商相聚于烟台,让烟台置身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随着外国洋行不断在烟台设立,它们也把西方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带到烟台。1867年外国商人在烟台成立了“烟台西商会”,这无疑给烟台商人提供了一个学习、仿效的范本。在频繁的贸易交往中,烟台的商人逐渐意识到商会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传统行会、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在对照模仿中逐渐淡化自身在成立初期还带有的传统行会色彩,使他们所在的商业组织制度更加完善,近代特征更加明显。

青岛港崛起后,烟台商业面临的压力让烟台商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1910年“烟台商务会”再次更名,新名称为“烟台商务总会”,设经理、协理二人,由坐办和账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14年9月,政府公布的《商会法》中规定商会为法人,是一个独立的、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这一年烟台第四届商务总会机构有所变动,设立正、副会长各1人,特别会董8人,一般会董40人。会长由会董和特别会董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不能超过两届。民国初期孙文山、于宗潼、刘肇亿、澹台玉田等人先后担任过烟台总商会的会长,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当属瑞丰面粉总经理澹台玉田,他前后担任了第四、第五、第七届的烟台总商会会长。商会实行选举制度,还制定了类似弹劾制的监督机制,已经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开会议事制度。这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会馆、公所组织的运行特征,标志着烟台在民国前期已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近代新式商人团体组织。在烟台商会组织不断完善的同时,入会商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919年时,烟台人口已经达到15万,

3000余家商号中入会的达到2186家,其中缴纳会费1—2元的小店商1437家,缴纳会费4—8元的中等店商634家,缴纳12—24元的大商号105家。可见商会在各层次的商家中均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而商人在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又使商会组织必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烟台总商会的巨大社会影响力首先是在“东西公共码头岸路工程”中充分展现出来的。当时烟台的洋行纷纷在烟台港抢地建私人码头,不断压缩华商的生存空间。为与洋商竞争,刚成立不久的“烟台大会”组织实施了“东西公共码头岸路工程”,在商人中募集白银40万两,在海关码头南部向西修建阻浪垒(亦称“海墙”),全长约1200米,宽17米。该工程1903年竣工,填海约450亩,使港口岸线自北大街向北推进约400米,为后来的城区发展拓展了良好的空间,初步形成了人工港池的南岸壁,还能够停靠一般小船。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重大工程,商会所具备的巨大号召力是以前各个会馆及公所商人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商会所体现出的由不同籍贯、不同行业商人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所具备的优越性——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开放性。

1916年,烟台总商会筹款建成了烟台最大的综合鱼市场——公利市场。该市场占地7.62亩,筑房570间,容纳鱼行最多时达120余家。公利市场的出现解决了长期以来鱼行在进货、加工及销售方面分散经营的状况。集中管理提高了效益,也让烟台总商会的权威得到了广大商人的认可。1917年,烟台总商会在会长澹台玉田的倡导下,又筹款在华丰街路南创办了贫民工厂,专门为无业贫民(主要是流浪儿童)提供读书学艺的场所。工厂占地18亩,厂房2000平方米左右,当时有学徒工约200人,能够生产台布、藤竹家具、煤油灯芯、布鞋等,年盈利曾达到5000多元。为富且仁,造福百姓,烟台总商会在当地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准确地说,商会只是一个服务于经济的团体组织,其基本职能在于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商家的利益,服务地方经济等。一位在烟台旅居多年的外国人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商会:“很可能,中国商

会最有用的功能,或者最主要的作用和能力,就是它所具有的仲裁能力。注重自己名誉的中国人,一般都不愿轻易将他们之间的争执诉诸公堂,寻求法律判决。”^{[4]34}

烟台总商会除了在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兼具部分行政方面的职能,就其在这方面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来说,超过了青岛、威海等周边城市,具有鲜明的特色。烟台与一般城市先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不同,它是直接在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自开埠以来到民国前期,一方面,外国人入烟后形成的外人居留区和商业区自行其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烟台作为一个城市的诸多功能;另一方面,行政上一直归属于福山县,1862年登莱青道改驻到烟台后,才建立起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至民国,烟台行政权又一度落入军阀手中。军阀频繁更换,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混乱不堪。在此背景下,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烟台商会组织不得不参与到地方自治系统的行政管理之中。民国前期,烟台分区自治,每一区设有邻、闾、街三级基层单位,每一级单位的负责人均由商会会员兼任,管理日常事务。商会与社会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作为当地政府雇用的工作人员,薪酬本该由当地政府解决,但因政府职能弱化,工作人员有时甚至几个月领不到薪水。这个问题后来在商会的参与下得到彻底解决。方案是设立一个委员会进行收税,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三人来自商会,二人来自政府机构,在得到山东省政府的认可后,自1923年开始实施,运行效果良好。此外,烟台总商会还组建了商会自己的武装“商团”,负责站岗、巡逻、维持地方秩序。1915年袁世凯特意就此赠予“弥患保安”的横匾对烟台商会加以表彰。

在近代商务经营活动中,烟台商人不断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视野日益开阔,越来越认识到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烟台总商会更是把资助教育事业当成份内之事。1931年创办的芝罘初级中学校董名单中,澹台玉田、林秋圃、崔葆生、王益斋、曹荫南等人都是商会会员。建校之初,由于经费紧张,收取的学费及校方自筹的经费难以为继,得知此情况后,总商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每月提供3000元以满足学校正常办学需求。

1916年,时任烟台总商会会长的澹台玉田联合商人陈秀安、万坤山等人共同成立了烟台教育会,附设平民学校并出任校长。1922年,澹台玉田又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名誉会长的身份邀请了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来烟讲学,同时各基督教会纷纷派出教师进行授课,入校学生年龄不限,分男校、女校招生,年长者有65岁,年少者仅有8岁。截至1936年7月,已办班26期,有过万人先后参加学习,一时掀起了平民教育的热潮,在国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44-46}。

面对近代民族危机,烟台总商会还积极参与到反帝爱国运动中。1915年到1924年间,烟台总商会为抵制日本侵占青岛,要求北洋政府拒绝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组织了“维持国货团”,举办国货样品展,为烟台总商会涂上了一层关心时事的政治色彩。

尽管商会作为社会组织,其成立得到政府的鼓励、支持,却不是官办机构,明显带有独立和自治特征。烟台总商会在民国前期顺势而为,抓住机遇,聚集了一批有声望和才干商业精英,在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经济能力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推动了烟台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烟台的商业、商人和商会无不体现着民国前期的时代特征。在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打压下,青岛在德国殖民统治下极大改善了营商环境,在对外贸易中全面碾压烟台,独特的政治环境让烟台商人绝地求变,在民族工业的振兴中展现了自己的能力。由他们所组成的烟台总商会的的影响力则更是大大超出了经济范围,除维护商人群体利益、发展地方经济,还积极承担起社会建设的其他责任。商业、商人、商会的互动,保障了烟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加快了烟台近代化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G].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社,1986.

[2] 庄维民. 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3] 蒋惠民. 黄城丁氏家族[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

[4] 阿美德. 图说烟台[M]. 陈海涛, 刘惠琴, 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5] 烟台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烟台历史掌故[M]. 烟台: 烟台市新闻出版局, 2005.

Yantai's Commerce, Merchants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 Jun

(School of Marxism,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Yantai 2646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nature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Yantai in the modern times once took the lead and became one of the emerging cities along the east coast in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Yantai thrived because of commerce, there existed inherent defects in industry, urb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tc., the potential of urban development was insufficient, and it was easily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After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rise of the surrounding port cities such as Qingdao, Yantai's commerce showed the situation of stagnation and decline. Yantai's merchants in trouble trie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djusted the focus quickly by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developing industry, vitalizing the city with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seek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they also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More and more business elites joined the organization, and made full use of this platform to ensure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rough this organization, Yantai's merchants played a variety of roles in social life, and gave play to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erchants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Yantai's urban moder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ir influence in the social field.

Key words: Yantai;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merce; merchant; chamber of commerce

(责任编辑 沂 溪)